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成果。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强大制度保障,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党强国的必然选择。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体系的发展脉络、鲜明特点、重大意义等,有助于更加自觉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建设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新时代,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更加艰巨的管党治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构建并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建设过程,是一个从作风建设破题、纪律建设深化、制度监督完善,到增强理论自觉和体系化建构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生动体现了实践每深化一步、理论概括就前进一步的特点,深刻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持续升华。

破题与概念生成。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中央八项规定出台,成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动员令。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包含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5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从“治”字破题,新时代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综合治理。

体系化探索与框架初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形成以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点和重大意义

吕增奎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为重点的治理框架。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形成“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要求“建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体制机制”。这一阶段,管党治党的体系化思维更加凸显。

命题提出与系统集成。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系统总结新时代十年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积累的丰富成果,作出“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大判断,提出“内容上全覆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的明确要求。这充分体现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从实践探索进入理论建构。

要素完备与结构完善。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组织体系承担组织嵌入与意志传导功能,是整个体系运行的结构基础,重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教育体系承担理论武装与价值内化功能,把外在政治规范内化为政治认同与行为自觉,重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监管体系承担偏差监测与反馈校正功能,是整个体系的“传感器”和“校正器”,重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制度体系为整个体系运行提供规则轨道与程序保障,重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责任体系驱动压力传导与激励约束,是整个体系运行的“增压阀”,重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的提出,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要素配置更加完整、结构功能更加成熟。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调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2026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

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也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从实践探索、理论建构迈向更高水平的理论化和体系化阶段。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点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覆盖管党治党全域的整体治党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系统运行层面的集中体现。这一体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系统观念为方法、以贯通覆盖为要求、以动态开放为特征,体现了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

政治统领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系统工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两个维护”构成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运行的最高政治原则,政治监督贯穿体系运行全过程。政治统领不是外加的要素,而是这一体系的内在要求。党的各项建设只有在政治建设统领之下,才能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形成合力。

系统整体性。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运行逻辑。从目标设定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这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要实现的根本目标。从主导机制看,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确立正确方向、价值取向。从转化和实现机制看,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把战略层面的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可问责的运行机制,把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各主体统筹整合起来,构成有机完备的治党

整体。

贯通覆盖性。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构建到哪里,不局限于正风、肃纪、反腐;在对象上全覆盖,面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管全党、治全党,重点抓好“关键少数”;在责任上全链条,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环环相扣,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在制度上全贯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四个“全”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在内容、对象、责任和制度上的整体覆盖和有效衔接。

动态开放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强调“制度建设要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配套,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同时,也要防止制度过于烦琐、陷入‘制度陷阱’。”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健全这一体系,既要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又要防止制度过载;既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又要保持制度供给与实践需求的动态适配,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在要素齐全、运行高效上持续用力。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把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把管党治党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提升到新水平,彰显了我们党的显著优势。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成效表示肯定,91.7%的受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所在地方和单位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表示满意。通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日益彰显,

我们党赢得了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努力保持革命性、先进性,列宁在创建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党的纯洁性,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但受制于时代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长期执政条件下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系统性论述有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着眼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刻总结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经验,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贯通起来,推动党的建设由单项推进向系统集成深化、由局部治理向整体治理拓展。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既在实践路径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又以体系化建构深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自身建设的理论。

为我们党长期执政筑牢制度根基。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确保党永葆生机活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贯通起来,使管党治党各项要求落实到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节。组织体系强化党的组织优势,教育体系夯实思想基础,监管体系发挥监督纠偏作用,制度体系提供规范保障,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构建起长期执政党建设的整体框架,形成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长效机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规范运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必须切实做到党和国家

事业拓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覆盖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管党治党各项举措从分散实施转向一体推进,以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得到全面提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取得新突破。同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发挥着贯通管党治党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功能。通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建设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更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等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效能。

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如何加强自身建设,防止组织弱化、保持发展活力,是世界许多政党共同面对的难题。我们党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逐步形成具有系统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管党治党机制,特别是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探索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路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强调政党自我主动治理,强调政党自身的责任担当,走出了不同于西方政党轮替模式的政党治理新路径,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特点,着眼于解决新时代党的建设突出问题,吸收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普遍联系、善于整体统筹的治理智慧,因而能够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这也对发展中国家政党治理形成启示:只有立足本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党情,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政党建设理念和路径,才能保持自身凝聚力、生命力,带领本国人民更好推进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科学方法,不断增强管党治党的科学性、系统性、有效性,把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管党治党的治理效能,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业有远近,功有潜显。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吴亚琴30余年扎根基层,一位接待服务群众2万余人次,调解纠纷2500余件,撰写900多万字的工作笔记;一位调解纠纷1000余件,探索实行“四步议事”“社区工作36法”,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他们植根人民、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潜绩同样可以惊天动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做强显功,也要做潜功”。潜绩与显绩都是政绩,辩证统一于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为民造福的实践,都要求心系人民,以实干出实绩。与即期见效、易于量化的显绩相比,潜绩需要默默奉献、长期投入方能成效,通常是积跬步至千里、积小胜为大胜,决定着显绩的底色和成色,事关根基稳固、全局建设与长远发展。夯基垒台之功,虽不显于一时,终会推动事业向前发展;潜修实干之绩,虽不耀于当下,定会化为群众口碑和事业丰碑。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潜绩最能体现党员干部的担当、格局和能力。谷文昌10余年在福建东山岛植树造林治理风沙;黄大发用30多年在悬崖峭壁上凿出“救命渠”;王战30多年坚守三尺讲台,践行立德树人、为战育人使命,这些都是潜绩。如今,东山岛沙白林绿,贵州遵义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王战带出的大批学生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领域骨干人才,生动印证了“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的深刻道理。埋头耕耘于潜绩者,扛国本重任而非浮华虚功、谋致远之方而非应急之策,计人民利益而非一己得失,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不计名利、脚踏实地的初心本色和鲜明品格。

深耕潜绩,需要正确认识潜绩在事业发展中的基石作用,明确潜绩与显绩并不对立、潜绩也是绩,杜绝把潜绩当作不思进取、庸政怠政的“遮羞布”,不作为、慢作为的“挡箭牌”。深耕潜绩,恰恰需要在矛盾最集中的地方破题,在基础最薄弱的地方筑基,在

深耕潜绩 固本致远

王芸婷

人民最期盼的地方发力。当前,我们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巩固拓展优势还是破除瓶颈制约、补短板弱项,党员干部都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敢啃硬骨头、敢接烫手山芋,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用潜功成就显效、将蓝图变成现实。

潜绩需要被激励。只有准确识别潜绩,让深耕潜绩者受认可、得褒奖,才能带动更多人投身创造潜绩、笃行实干。科学考核潜绩,需要将群众评价作为标尺,多在田间地头听民意,多进村入户看实情,从群众口碑察实效,避免“只对上表现,不对下负责”。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考虑政治和经济、当下和未来、物质和精神、发展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善于算大账、总账,不简单以经济数据、表面成绩论英雄,避免“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树立可持续发展、接力奋进导向,开展长期跟踪问效,将决策部署的长远影响、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进展、基础性工作的累积成效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维度。强化考核评价针对性,运用差异化、精准化、科学化的考核评价方法,因层级、因地域、因部门、因岗位、因条件制定考核评价方案。

历史最公正,从不埋没每一份功在长远的坚守;人民最深情,永远感念每一份亲民爱民的耕耘。广大党员干部务实担当、知重负重,既善创可见可感、惠民利民之佳绩,更甘为国本兴邦、泽被后世之潜绩,定能积土以成崇阿、汇流以至河海,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完善农家书屋功能 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

肖 鹏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强调:“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农家书屋是保障农民阅读权益、促进乡村阅读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今年6月印发的《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要进一步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以丰富的阅读设施、优质的阅读资源、常态化的阅读活动,更好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本世纪初,为补齐农村阅读设施短板,我国启动实施农家书屋工程。经过多年建设,农家书屋已广泛覆盖农村地区,成为乡村阅读的重要阵地,为培育读书风尚、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农村人口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和信息获取渠道发生深刻变化,也对农家书屋提出了新要求。当前,部分农家书屋图书资源供给的针对性、时效性有待提升,存在阅读活动吸引力不足,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结合不够深入等问题。要着眼新形势新要求,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在盘活空间、配优资源、做实活动、健全机制上出实招、求突破,推动农家书屋更好扎根乡村、服务农民。

优化书屋布局。科学布局是发挥农家书屋作用的基础。伴随农村人口流动加快、村庄布局调整,部分书屋选址与农村实际情况和需求出现脱节。要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乡村实际,把群众在哪里、需要什么、如何使用农家书屋等情况了解清楚,对农家书屋建设进行动态调整,促进其建设布点更加精准实用。可通过场

地共享,推动农家书屋与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史馆等融合发展,不断升级服务能力;通过共建共享,促进农家书屋与乡村学校图书馆(室)深度联动,建设贯通校内校外的阅读体系;通过资源联动,把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公共服务引入书屋,在突出阅读主业的基础上拓展功能,打造“小而美”的特色阅读空间,促进阵地融起来、资源动起来、服务连起来。

提升内容品质。农民是农家书屋的目标受众,提高农家书屋图书内容品质要在“农”字上下功夫。从“准、优、新、活”四方面入手。“准”就是精准服务农民阅读需要,可健全需求征集和阅读反馈机制,推广“百姓点单”“你购书、我买单”以及“订单式”“菜单式”服务,让图书供给契合群众需求。“优”就是推动优质资源直达基层,加强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出版发行机构等协同联动,拓宽好书下乡渠道。“新”就是让馆藏保持活力,健全图书资源动态补充和定期更新机制,促进优质图书在城乡之间、书屋之间有序流动,确保书架常新、好书常在。“活”就是让农家书屋从“有书可读”进一步走向“有人来读”,积极组织科普阅读、家庭阅读等主题阅读,把图书选配与阅读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吸引更多读者。

加强阅读推广。农家书屋是培养乡村阅读风尚、助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要通过科学引导加强阅读推广,让更多农民参与阅读、爱上阅读、受益于阅读。聚焦重点群体,让阅读服务走近更多人群。面向农村妇女儿童,把亲子共读、家庭阅读指导、儿童阅读陪伴等做成常态服务;面向老年人、返乡青年等群体,结合其生活特点和实际需要设计阅读项目。聚焦乡土记忆,把地方文献建设与阅读推广结合起来,通过乡土文化讲读、村史共读、口述记忆等活动,让群众在阅读中认识家乡、记

住乡愁。聚焦专业内容,深化与公共图书馆、书店、社会力量合作,不断提高阅读活动的质量水平;开发适用于农家书屋的阅读推广工具包,把创新理念和前沿经验转化为基层拿来能用、用之有效的专业工具。聚焦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群众认可、富有实效的阅读活动,培育一批具有乡村特色、影响广泛的阅读品牌。

健全管理运行机制。推动管理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是促进农家书屋更好实现资源下沉、服务群众、涵养乡风的重要抓手。可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动将农家书屋纳入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统一管理,在图书流通、业务指导、活动组织等方面建立完善的统筹管理机制,让分散的农家书屋接入专业化、常态化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在坚持公益属性、保障基本服务的前提下,探索更加灵活的管理和使用方式,引入专业力量参与运营,探索公益认养、项目认领、合作共建等创新方式,增强农家书屋运行活力。健全人才队伍建设机制,加强书屋管理人员和志愿服务力量的专业培训,重视阅读推广人的培养机制与乡村阅读组织的孵化机制,让更多懂阅读、会推广、善服务的人扎根基层。创新评价机制,突出服务效能导向,立足农家书屋深耕乡土、服务群众的特点,既考察投入保障和运行基础,也关注资源利用情况、群众受益程度,避免片面地以农家书屋的数量和规模作为评价依据。

(作者为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